“中国制度”十三讲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13个部分组成。这13个部分如何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独有的“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有着怎样的优势和特色？《“中国制度”十三讲》邀请权威专家解读“中国制度”。

第一讲：以制度保障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主讲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谢春涛指出，全会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处于首要位置，而且贯穿于其它制度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

　　谢春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党领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制度，领导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建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尤其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我们想一想，奇迹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所以党的领导怎么样从制度上落实、保证而且科学有效，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人民的福祉，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从多方面做了说明，做了阐述，做了规定，我觉得这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引领的作用。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从一穷二白走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能让社会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东方大国扎根生长，才能让一种新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华大地发展完善，历经无数风雨而始终生机勃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谢春涛指出，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为中国百姓所感知，一些外国人甚至西方人也无法否认这样的优势所在。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中国政治有稳定性、连续性，我们国家可以制定出一个个五年规划，又得到很好的执行，现在已经到了第13个了。再比如我们的决策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而且做出之后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十九大之后，我曾经去一个西方国家访问，一个资深的政治家说了这样的话：“你们的党还能考虑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能考虑之后几十年的事情，只有你们这个党啊。”我想他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了解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区别，这也说明我们党的领导的显著优势之所在。

　　这次全会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谢春涛强调，制度是定国安邦的根本，成就伟业的保障。这六个方面的工作虽然近些年一直在做，但是这次作为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提出，强调制度建立、制度健全、制度完善，有了更系统、更深入、更全面的要求。

　　谢春涛：我觉得这次关于党的领导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一个是要坚持我们有效的这个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完善这个制度。比如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这之前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要求，是一种号召，是一种宣誓。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落实到制度上。包括党的先进性，具体体现在一个党员、一个组织上面，怎么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那也要依靠制度。所以我认为这次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制度体系也好，还有包括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好，最重要的它是体现落实的制度上，要把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好的做法，通过制度化的建设，让它能够更加有效、更加稳定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第二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主讲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邀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13个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中重要的内容。全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怀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法治体系日趋成熟和定型，法治国家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特别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法治体系建设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实践中如何来落实这一项要求？

　　马怀德：应该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四个环节，四个方面来进行。首先还是要坚持科学立法，其次要严格执法，同时还要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上都能够做到厉行法治，能够有效地推进法治，那么我们一体建设和共同推进才有可能实现。

　　马怀德认为，法治体系在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中，起到的是重要骨干工程的作用。

　　马怀德：因为所谓制度是一套规则体系，更多的是静态的东西。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成一种治理效能，主要还是要靠法治，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另外一方面要把制度运行好、执行好，要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树立制度的权威，让制度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化成治理效能，最终为实现建设现代化法治强国做出努力。

　　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马怀德说，这抓住了当前法治建设的难点和痛点。

　　马怀德：法治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所以如何能够确保法律法规，包括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当前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这次四中全会提出就是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健全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同时对法律实施中的比如不作为、选择性执法、滥用执法权力……对于这些现象要加强监督，有效的改革，解决这些当下的问题。

　　马怀德分析，虽然宪法的权威日益提升，但是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全面实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的空间。同时，立法中的针对性不足、质量不高、操作性不强、立法不及时的问题也是制约法治建设发展的因素。

　　马怀德：比如对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落实问题，就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的安排。对于社会上的违宪违法问题，如何加以纠正，也需要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未来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任。要在体制机制上想办法尽快地提高立法的质量，确保立法能够在改革发展中发挥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让立法真正的成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准则。

　　四中全会在部署未来的法治体系建设的任务时，首次提出“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的概念。

　　马怀德：之所以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无论是在立法、执法，还是司法各个方面都可能存在，也可能出现过由于制度不健全、立法不公、执法不公、司法腐败、制造冤假错案、滥用职权等这些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影响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以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

　　马怀德说，这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法治保障，而这种保障又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立法、体现在执法，也体现在司法方面。

　　马怀德：最重要的就是要营造全社会尊崇法治，严守法治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氛围，从而确保我们全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通过法治予以保障。这应该是这次四中全会在部署法治建设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仅仅有制度是不行的，而需要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

第三讲：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主讲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信春鹰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信春鹰指出，全会通过的《决定》，充分阐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信春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从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来看，各级人大代表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我们国家五级人大代表有260多万，在这260多万各级人大代表中，绝大部分是基层代表，他们根植于基层，了解民情，了解社会，能够汇集民意，反映民智，通过各级人大代表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投身国家的各项事业，这也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功效。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信春鹰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信春鹰：首先，它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政治理念。二是它能够组织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参加、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保证国家机构和政府各个部门依法履职。人大是立法机关，人大通过立法明确各个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职责，并对这些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各个政府部门能够形成合力，依法履职，保证国家机构的高效运转。四是它能够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适应。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包括必要的时候通过修改宪法来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应，从而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和和谐，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春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都体现在法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实施。换句话说，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巨大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了。现在国家的立法是275部，地方性法规已经达到了12000部，行政法规达到了700多部。在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架构下，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实际上涉及法律实施的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重视法律制度的实施，要让法律制度成为“有牙齿的老虎”，在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方向、主要任务、工作要求和重要举措，明确回答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些重大问题。

　　信春鹰：四中全会的《决定》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明确提出党要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要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制度，也特别提出要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更好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这些都是未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特别关注的工作的重点。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依法履行职责。人大代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加强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全会通过的《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信春鹰：我们有260万名各级人大代表，基层人大代表除了自身依法履职外，还要和他们周围的群众密切的联系，成为把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现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代表工作站，每位人大代表定期地到代表工作站去会见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为他们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以后还要继续深入推进，让这些桥梁和纽带更加牢固。

第四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主讲人：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满传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王满传表示，要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文明悠久的行政管理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王满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最本质的特征。四中全会明确，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重大职责。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按照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来履职，这就定位了我们政府的履职，这也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行政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中国特色，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里有很丰富的行政管理的实践，也有非常深刻的行政管理的思想，这些也构成了我们当代行政体制的一个思想文化源泉。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建设、国家政权的理论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特别是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管理、行政体制做了很多重要的论述，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重要的部分。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优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体制。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王满传认为，四中全会已经非常明确，未来国家机构的职能要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着力点进行推进。

　　王满传：优化，就是机构的设置要科学合理，职能配置要科学合理。协同，就是行政部门之间，避免职责交叉，避免政策冲突，大家共同的履职好。可以说没有优化，没有协同，也谈不上高效，当然，高效还有其他的，比如有一些新的管理方式，要用现代信息化的手段；比如国务院建的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各个地方都在做，最后通过同一个信息技术平台，可以减少层级，不需要层层往上报，因为在一个平台上，效率更高。优化协同，协同包括了不同层级政府，这些都是在促进政府高效履职，所以着力点是我们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方向。

　　在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方面，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王满传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放管服改革，划定政府的权责清单。

　　王满传：政府的权力责任很清晰、很规范、很标准，这有利于政府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来履行职责，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十八大以来，我们营商环境明显大幅提升改善。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3年在190个经济体中我们排在第96位。到今年刚刚发布的，我们排到第31位了，这就是这几年放管服改革的直接体现。通过我们的改革、体制的优化、制度的完善，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方便企业，方便群众，激发市场活力，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如何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中全会提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王满传表示，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度”，从而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王满传：首先为了保证国家的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宏观事务的管理肯定要加强，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特别强调，要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的职能。一条河流跨好几个省，一个地方的空气污染会影响到另外的省，这种跨区域、跨流域的事情，仅仅让各个地方自己去做，效果就不太理想，像这种事情，中央要加强。另一方面，地方是直接面向群众、面向市场主体的，它没有自主性，有些管理起来，可能效率就低了，就不顺了。这个度在哪，需要逐步探索，这就是这次四中全会讲的，慢慢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定型。

第五讲：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讲人：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首次完整阐述什么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归结为“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三者的统一。

　　周汉民：第一就是所有制。我们强调中国的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一。从41年前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巨大体量的非公经济勃兴，到相当数量的外资进入，都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特征。第二，这一经济制度还谈到了分配方式，也就是我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同样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因为我们对生产力的构成不断有新的认识。这一次的决定就谈到生产力构成不仅包括我们过往所说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资本本身，还包括知识技术、甚至谈到数据。许多新的领域，它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应当保证，但是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更应当鼓励。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这就是运行。我们谈所有制，我们谈分配方式，关键是运行，运行与前两者如何一个逻辑关系，公报和《决定》予以明确。（基本）经济制度有这样的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再认识，是一个新的提升，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四中全会《决定》一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时期如何去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周汉民认为，这是对市场要素及其作用的再认识，也是对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的再认识。

　　周汉民：这个市场到底什么是它的要素？往往过去想到贸易、投资、运输这几块，认识是比较充分，但对后两块新需要加强认识：第四就是人员的自由择业，第五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革命对市场发展的推进和催生。过往的市场力量，更多地依赖政府的主导。而今天更多的依赖市场自我的调节。但是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也就该管的要管，该放的要放，该管的要严管，该放的要完全放开。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群团，包括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这个力量不能小觑。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三股力量的配置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就是要用好市场的无形的手，是决定性的。

　　这次全会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周汉民指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并不是对立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调的是“效率”，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周汉民：对外贸易的出口、全民的消费提振、固定资产投资，这就是需求侧三驾马车，这三桩事都要往前进，中国才有未来。供给侧强调的是，从一般的对生产力的理解，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振，供给侧强调的是效率问题。我们对土地、人力、资本这三者关注，当下更要关注的是科技的力量和政府管理能力所催生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提振，这五要素就叫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向谁要？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供给结构性改革不能浅尝辄止，要继续全力的往前推动。我们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科技成为提高效率的根本，让管理真正上一个层次。

　　而对于如何实现“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目标，全会《决定》部署了五个重要的坚持和努力方向：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比以往，“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被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

　　周汉民：我们一直在科技创新、科学发明这两条路上前行，但是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基础科学仍然薄弱；第二，我们的科研力量还没有真正地凝聚起来，低端的、中低端的重复太多；第三，长期和中长期关系还没有理顺，比较注重短期效应。所以我说两个导向：要有问题导向，要有项目导向。大家结合起来，核心的核心是人才观，要用好。从资源来说，不求最好，只求实用。抓住牛鼻子，就是：要攻关的，国家挺身而出；要发展的，让市场百川归海，只有这样才行。

　　周汉民认为，全会《决定》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更高”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永不止息。

周汉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汇入江海之中，就是要学会游泳。而学会游泳，一定要在江海中学会，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辩证（统一的）。41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是石头？我们要有试验田。我们现在31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之外，已经有18个自贸区，上海再设立新片区。开放型经济，什么叫更高层次？今天自贸区的努力就是更高层次。我们要用这些地方作为试验田，最后形成对整个国家有引领作用的更高层次的提升，而且这一轮一轮还要（继续）下去。道理很简单，中国前进的步伐永不止息，她是浩瀚江河，她必须进行“将世界的规则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中国化”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在这条道路上前行，那么人类文明、一切伟大成功，皆入眼帘。

第六讲：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主讲人：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鹤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王鹤云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更好地保障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在《决定》中用专章对坚持和完善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目标、使命任务、方针和原则。

　　王鹤云：这是对我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系统梳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在制度层面的高度凝练和集中呈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指南，也充分彰显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王鹤云认为，这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推进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提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

　　王鹤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恪守党的本质属性、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思想基础、凝结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文化领域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制度来展开、来推进。无论是理论武装还是新闻宣传，无论是文艺创作生产还是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是精神文明创建还是网络建设管理，都要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彰显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王鹤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熔铸于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光明前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内在的先进性、广泛的包容性，决定了其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居于主导和引领地位。

　　全会提出，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这体现出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贯彻落实。

　　王鹤云：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特别是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让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充分有效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全会提出：“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

　　王鹤云：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是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动员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需要，是赢得舆论斗争主动权、更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需要，是改进创新舆论宣传、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需要。

　　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机制。王鹤云认为，这个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产品属性和文化生产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王鹤云：文化产品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贯彻《决定》要求，就要不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机制。

第七讲：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主讲人：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杨志光、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杨志光认为，“病有所医”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自觉行动，是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

　　杨志光：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实现“病有所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实现“病有所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还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病有所医，切实保障好人民健康。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认为，做好“老有所养”对国家、民族、社会来说都意义重大。

　　李邦华：从国家角度来说，目前我国有2.5亿老年人，而且老年人口还在不断增加，老有所养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国家对老有所养有重大的制度设计。从民族来说，养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从社会来说，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有所养、健康长寿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期盼。做好养老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也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大事，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老有所养做出了重要部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杨志光分析，实现“病有所医”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让群众少得病、得了病有地方看，要看得起。”具体讲，要从落实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两个重点问题进行发力。

　　杨志光：看病难方面，要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解决卫生健康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包括通过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进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建设，做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等，破解优质医疗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构建科学合理的诊疗模式和就医秩序。二是加快优化服务体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县域综合医改，整合优化县域资源配置，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深化基层运行与分配机制改革，注重发挥中医药作用，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等，推动建立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是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杨志光分析，在看病贵方面，要实行“三医”联动。当前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因素是药品价格虚高、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过快等，涉及医疗、医保、医药三个方面，问题相互交织叠加。

　　杨志光：一是降低药品费用。组织实施药品集中采购，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和使用政策。加强医疗机构药品管理和规范使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加大对抗生素、辅助性和营养性药品的使用监控，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使用。二是扩大保障效应。进一步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推动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医保总额预付，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机制等，充分发挥医保的基础性作用。三是规范服务行为。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的协调机制和督查机制，加强全行业、全流程、综合协同监管，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医疗服务供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老有所养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李邦华在解读中谈到，党中央高度重视老有所养工作，要推动老有所养制度取得重大突破。

　　李邦华：进一步强化政府兜底线保基本职责。这个底线就是城乡特困供养服务制度和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切实兜住。基本就是，要以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为方向，以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为重点，加快建立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制度。进一步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无论是在家里、在社区中、在养老机构中都能得到较好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健康管理等各方面需求，实现健康长寿、老有所养。

　　总体上看，我国老有所养面临着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等重大挑战，党的十九大把老有所养列为了亟待补齐的民生短板之一。李邦华分析，持续做好老有所养工作，还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李邦华：继续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完善持续优惠政策，让社会力量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支持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健康、养生、金融等行业融合发展，创新和丰富养老服务业新模式与新业态。完善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确保养老服务安全，让老年人安心养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质量。

第八讲：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主讲人：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局长彭波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此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局长彭波认为，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是共建共治共享，制度机制是重要保障。

　　彭波：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那么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了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彭波认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国家治理的成效。近年来，我国在推进社会治理进程中的鲜明特点和亮点，就是创新。

　　彭波：我们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健全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那么我们创造了世界罕见的“两大奇迹”，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另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2018年，中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了51.8%。联合国在2018年《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报告中指出，中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数据也充分显示了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效，也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巨大优势和显著效能。

　　社会建设得好不好、运行秩序行不行，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彭波认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参与程度，而要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

　　彭波：这次中央提出要打造这样一个共同体，它就是要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种群众组织、社会组织都要调动起来，要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我们知道社会制度的力量在人民群众，智慧也在人民群众，所以我们要通过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把社会方方面面力量都调动起来，那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格局，也是我们社会治理的今后的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加速流动，社会进入了风险高发期、矛盾凸显期。彭波认为，这也反映出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彭波：要主动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制度、新机制。

　　社会治理不能只靠政府单打独斗，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彭波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彭波：首先就是要完善前端预防的机制，重点就是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机制保障的制度通道，真正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完善人民信访制度，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其次就是要完善多元化解机制，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最后是要完善疏解引导机制。那么近些年来，有个人极端行为引发的恶性案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必须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心理干预。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疏导工作，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戾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彭波认为，要创新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就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以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重点，以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为基础。

　　彭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了重要部署。那么第一，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重点在于加强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要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

　　彭波认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础在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威力。下一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方向是，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

彭波：“立体化”就是要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法治化”就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治安防控，以及法治方式来破解治安难题。“专业化”要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智能化”就是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强大引擎，不断提高治安防控的智能化水平。

第九讲：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主讲人：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吴舜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吴舜泽指出，在十九大后，再次重申这个论述，是因为“环境就是民生”，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地位正在不断强化。

　　吴舜泽：核心意思讲的是生态环保的根本性地位，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基础性地位。过去我们讲是征服自然，叫人定胜天，（现在）调整人和自然关系、人和自然和谐，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环境不能作为低价的生产要素被忽视，也不能仅仅像有些地方说的，把它作为支撑发展的一个承载条件，实际上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稀缺资产，要高标准去保护，而且优质生态产品是发展的有机内涵，加强生态环保工作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我们出台了比如自然资源负债表、离任审计、主体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总量控制的一些制度。我们的意识和理念，通过制度就得到一个改变。

　　而在四中全会《决定》中同时强调的，“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途径。吴舜泽说，在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一步理顺。

　　吴舜泽：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制度里面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它不是对立的，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创造价值。这句话，要多次讲，主要是因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不是一时一地、一朝一夕就能够简单地去解决，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解决了，所以他这要反复讲，要让他知行合一。

　　《决定》明确，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吴舜泽说，创新的将上述四个领域的制度体系统筹考虑，更有利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吴舜泽：这次决定把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4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制度体系，这种提法是第一次，是一种理论突破。我们此前有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包括深改组此前审议通过了大概40多个生态文明单项制度。所以这次决定最主要的，不在单项的制度的突破，是在制度的体系化，集成高效，协同增效。

　　而这些统筹考虑形成的制度链、政策簇也进一步指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心已经从污染防治为主转变为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吴舜泽认为，这对今后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吴舜泽：你比如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重在是最严格，必须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外部性的问题。那么污染物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放错了或者浪费掉的资源。所以要源头防治的话，就必须要资源的高效利用。那么生态保护，我们经常讲是一体两面，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本身我们叫协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所以这两者关系更密切。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实际上是过去生态文明建设或者生态环保工作的问题所在，也是未来着力点，责任制度收尾兜底，体现了对其他三个方面的制度的统筹促进作用。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决定》中特别明确，要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快建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监测制度，健全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在吴舜泽看来，这些制度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正在不断被重构，在这里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我国生态文明不断探索，实践的保障。

　　吴舜泽：我们经常在讲中国之治的密码是什么？制度就很重要，生态环保尤其（是这样），过去的生态环保制度几乎在十八大这五年来基本被重构了。其中重构着力最多的是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过去环保法或者其他的制度大多数对排污者起作用，但是这些年开展中央环保督察，进行量化考核，责任终身追究这一系列制度，按照考责、履责、追责这个环节，层层相靠的把这个链条建立起来。我们为什么这些年环保的工作在国际上变为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主要也是制度起到很多作用。难以想象我们这么去采用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方式去搞环保工作，这是我们取得工作的成效的一个关键。所以生态文明这个词过去国际上不能理解，但现在是比较流行的英文词，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一个体现。

　　此前环保工作中不少行之有效的制度举措也写入《决定》中，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而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则包括了“主体功能区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等十余项。吴舜泽认为，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进一步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从而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吴舜泽：我们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在四中全会的表述里，任务还是比较重的，要让制度来重构重塑我们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把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动方式、生活方式整个全部调过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全民参与，形成一种社会共治的一个体系。这次专门提出要增加我们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要通过法制的、技术的、经济的、标准的、政策的各种手段，来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程度进一步提高。体制是管最基本的事情，体制一变，一定会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第十讲：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主讲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传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其中，以“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为题，《决定》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进行了详细阐述。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传宝指出，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王传宝：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政策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一要求，是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做出的强调，为我们进一步铸牢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这本身既是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内容的有机部分，同时还将起到有力捍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外部环境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报在阐述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内容时，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出要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王传宝表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王传宝：公报再次做出鲜明强调，是与党的十九大精神一脉相承的。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重中之重。党领导和掌握军队、军队听从党的指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有了坚强的战略支撑和可靠的力量保障。

　　回顾人民军队92年的辉煌历程，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王传宝表示，经过长期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日臻完善，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制度保证上讲，就是要坚持军委主席负责制。

　　王传宝：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必须把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突出出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指挥，这样就能有力地保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确保顺利完成军队改革的攻坚任务。可以说，公报的这个强调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当下又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思想的引领。王传宝指出，在全军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之际，此次全会再次强调，“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这对于广大官兵更好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传宝：十八大以来，强军事业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主席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写入党章成为全党意志。今天全军部队早已形成了这样的高度共识，那就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全面推进强军事业立旗定向的根本指针，谋篇布局的强大法宝，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凝魂聚气的精神旗帜，必须以此为根本遵循并长期不懈地一以贯之。

第十一讲：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主讲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党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认为，《决定》对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定位，有利于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韩大元：首先是对“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总结和概括。香港回归22年、澳门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用这样的一种重要制度来加以概括，有助于我们未来进一步地巩固“一国两制”的伟大成果。同时，“一国两制”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制度，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创新的高度的评价。在未来新的挑战中，“一国两制”按照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决定》提出，“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如何践行“一国两制”？

　　韩大元：《决定》明确提出，“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于“一国”，统一于“一国”。虽然“一国两制”的关系，过去我们也谈过，但是《决定》更加准确、更加精确地表达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那么，如何推进“一国两制”的全面实施？《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尊重国家的宪法，尊重基本法，用法治的思维来推动“一国两制”的未来的发展。这方面《决定》提出的有关“一国两制”的新的目标、新的措施，将有助于“一国两制”的发展，特别是有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安全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韩大元认为，《决定》关注如何科学的认识“一国两制”、尊重“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的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

　　韩大元：我们既要强调中央对“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应有的管治权，同时也充分地尊重高度的自治权，要把高度的自治权和全面的管治权辩证统一起来，不能把两者对立。我想这是《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基本要求。

　　《决定》明确，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韩大元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一国两制”新实践。

　　韩大元：我们始终要坚持“一国”的一个前提，“一国”的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制度的发展当中，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应该要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但是，根据“一国两制”的理念，我们首先要强化“一国”的意识、国家的观念、国家的意识，而要提升国家观念、国家意识，必须要强化对宪法和基本法的认同。在这一点上，四中全会（决定）也特别强调，要加强对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宪法、基本法的教育，中国历史的教育和国家观念的教育。我想这一点对未来我们建设粤港澳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未来建立中国法治的文化，强化我们的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决定》强调，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11月4日，《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也就是“26条措施”出台。韩大元说，“26条措施”宗旨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一脉相承，是“31条措施”的加强版。

韩大元：“26条措施”为台湾的企业提供了同等待遇的措施，大概涉及到13条。为台湾同胞提供了同等待遇的具体的措施，也是13条，包括领事保护、农业合作、文化体育等方面，这样进一步的提升和帮助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科技的创新，为台胞在大陆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好的便利和条件。“26条措施”特别关注台湾的青年人，通过这样的一种政策到大陆来发展，能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确实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

第十二讲：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讲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阮宗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阮宗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了“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西方逻辑。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新高度上，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和努力方向。

　　阮宗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对接，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来有两个构建，一个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第二个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把中国梦是说中国本身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有一个世界梦。这个世界梦是什么？就是大家关注你中国发展以后，你对世界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构想。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回答了中国的世界梦（是什么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中国梦、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为国际社会创造更大的机遇，创造更大的红利，而不是损害别人。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世界好，中国也会更好。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全会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阮宗泽表示，为国内改革与发展服务，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以合作促发展、依发展谋和平，两者不可偏废。

　　阮宗泽：中国外交要为我们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的发展路线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所以就要统筹国内国际这两个大局。在外交上，中国要坚持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有了和平中国就有更好的发展，而且中国这种发展不是一个零和的发展，追求的是互利共赢。这是一条。同时在发展过程当中才有更大的能力、更好地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全会提出，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阮宗泽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这些辉煌成就归功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阮宗泽：党的领导是我们外交工作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政治保障。那么怎么体现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牢记外交的大权是在中央。所以接下来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建设就是为了进一步全面的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的落实，所以方方面面要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进一步的统筹、完善、健全机制，这样才能够保证党中央的外交大权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新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此次，全会也再次明确，要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阮宗泽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不断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对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实现新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阮宗泽：中国通过外交布局的这样一种完善，我觉得有助于一方面把中国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一个衔接、有效的对接，同时也更好地维护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全会提出，要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阮宗泽表示，在新时期，中国的更高质量的发展就在于更高水平的开放。

　　阮宗泽：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开放，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开放，而且外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放（领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构建一个开放的体系？我想一个就是加入多边机制，加入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中国今天已经加入了几百个国际体制机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要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单边主义的一些做法，它实际上是逆流而动。所以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长非常快的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利益就在于怎么样进一步维护世界的开放性。而且，有了更大的开放，中国就有了更大的朋友圈、伙伴圈，那么也就有了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一些挑战，更好地保护和促进中国本身利益的发展。比如说，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开放政策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全会也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阮宗泽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特别是当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正当其时。

　　阮宗泽：全球治理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高频词。为什么全球治理体系现在如此受到关注？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出现了一些赤字，也就是说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国际社会在应对这些问题方面还缺乏一些成熟的机制甚至理念。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比如说单边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在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它们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它们并没有在现有的国际体制机制当中得到应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所以全球治理的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怎么样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它的权利。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作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贡献。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无论从自身的发展，还是进一步推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角度来讲，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中国都当仁不让，都有自己的责任。

第十三讲：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主讲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苗庆旺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明确了监督体系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战略决策。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苗庆旺指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治权，治权离不开监督。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各级各类监督主体、监督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中求进，统筹推进。

　　苗庆旺：首先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因为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灵，其它监督不会有效。因此要落实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责任，包括各级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纪检组）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的责任，同时还要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利。而党内监督首先要聚焦“关键少数”，因为我们的各级干部手中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党内监督要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制度，破解目前存在的对“一把手”监督难和同级监督难这两个难题。

　　除了完善党内监督，还要强化纪委和监委的专责监督，促进各类监督的协同贯通。

　　苗庆旺：主要包括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的统筹衔接，在此基础上还要推而广之，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和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统计监督是第一次写进全会文件，因为根据统计法，统计局可以对统计数字造假进行监督，提出处分问责的建议。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上述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目的是汇聚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

　　全会对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作出部署，提出要“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苗庆旺表示，这体现了对权力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

　　苗庆旺：我们都知道权力具有强制性、扩张性和作为工具的二重性，它既可以用来为公众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本人谋私利。因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都要强化监督和制约。党的十八大以来，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体系日趋健全。下一步，要坚持权责法定，依法科学配置党政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和定期轮岗制度，完善权责清单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权力制约。

　　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还要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苗庆旺指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一体推进“三不”，揭示了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苗庆旺：要实现“三不”一体推进，首先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也就是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其次要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三是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加强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根本不产生腐败动机。

　　苗庆旺强调，“三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更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必须打通三者内在联系，科学谋划、统筹安排，强化“三不”融合协同。

　　苗庆旺：在推进“不敢腐”的时候，注重挖掘“不能腐”“不想腐”的功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中去查找问题线索，用理想信念和党的政策去教育转化审查对象。在推进“不能腐”的时候，要注重吸收“不敢腐”和“不想腐”的有效做法。比如说要研究案件暴露的体制机制漏洞，还要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认识规律。在推进“不想腐”的时候，则要注重发挥“不敢腐”和“不能腐”的威慑与约束，也就是开展警示教育，促进以案为鉴，同时还要通过相关制度来固化我们的教育成果。也就是说只有把这“三不”融合起来，协同推进，放大叠加效应，才能够真正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切实维护好党的肌体健康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